

DACHAOSONG

大潮颂

主 编：周鸿寅

副主编：欧阳学忠 周鸿猷 方筱君

大地厚土

政文 安卿 显福

尽管中央电视台和省地县各级舆论载体都舍得花时间和版面竞相披露：黄士保承包郧县国营原种场，四年来产值增长27倍，利税分别增长32倍和24倍，固定资产增长15倍，因此，企业夺走了湖北省农业三场“最佳经济效益第一”的优胜杯，扛走了农牧渔业部亲授的全国农业三场“先进单位”大红锦旗；尽管取经者络绎不绝、大小会议连续不断，都想得知这从72万低谷一气冲上2000多万高峰的秘诀；尽管京城、省府不时有大人物不辞颠簸到原种场赞叹：“这里有特区的精神、特区的速度、特区的效益！”但是翻开当今炙手可热的企业家“列传”，还找不到这位黄士保带领原种场走出荒原的踪迹。

生活常常是这样：某人某事已经或基本达到某种标准和程度，但因为没有第一个人站出来勇敢地承认他（它），所以，大家也就都不加肯定。我们也没有勇气来做“第一个”，企图以此让主人公入某“家”之列，但我们还是有勇气来写一个超乎某“家”之上的一个人。

一、黄士保的仕途经济

——什么？问我？

和共和国同岁，不，整整小一个月。11岁上，死了老爹。小学六年级还没读完三个星期，唉，读不起了。捡牛屎粪、当篾匠娃子，那鬼年月，啥活计！没干过？啥时是个出头的日子？噢，那时候扛枪杆吃香，老子再也不想窝在这穷坑里，16岁便一蹶子弹下河南。在省府站过岗，在第二监狱看过劳改犯，到沉湖挖过臭泥……一去就是13年。记得有次回老家柳陂公社探亲，一看乡亲们仍然过的是一天三、四角钱分值的穷日子。我劝公社干部让社员搞点工副业，监狱都能搞，这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不能搞？公社干部哈哈大笑：“我的黄士保，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我们的任务是抓阶级斗争，抓粮食……”见鬼了，弄口饱饭吃就是搞资本主义？我没有骂他们，骂了也没啥用，那时连我自己都迷得不开窍呢！再说，骂领导没个好处，因为骂过一次我们的师长无能，尽管你怀揣硬崩崩的党票，13年，才捞了个小排长……

喂，请别误会，我不是想当官！那年月，看到部队首长和家乡干部稳稳当当吃皇粮，我这个穷娃子眼气死啦！现在，我也能端起这个饭碗，知足喽！

没人说我想当官，没有。乡亲们没说，战友们没说，他们相反说咱有出息。是的，咱混出穷坑了嘛！可是现在，有人骂咱想当官、有野心，一直骂了八年。

——啊？问我？咱嘴结巴，说话不利闪，对不起啦！

这原种场子，是国民党留下的农林试验场，1973年才改成原种场。这儿老百姓几十年来就是守住这几千亩试验田，死巴巴地种良种。种穷了！种疲了！种怕了！这东西不能种杂，一杂，苗儿就要拔一半，造成减产！不拔？缴不上去。

缴不上去，就没钱买粮吃！那年月，咱搞农业科学技术的说话，还不如场长放个出溜子屁！珍珠矮，我说插“三六寸”，场长硬要“合理密植”插“三五寸”。结果，多插的一寸不仅没创高产，相反减产10万斤。这儿农工遭孽，活路太苦了！我想求场里买个联合收割机，解放劳动力，咱场的书记说：“就是不给你冷大林买！”笑话，给我买？这良种是为我种的？我1962年就来这场子，因为成份不好，文革时一边低头认罪，一边老老实实下田，泥一把、水一把搞试验。那时，我发现唯一能使我安慰并能忘却烦恼的地方，就是农田，于是我天天泡田里。我的“毛南”杂交小麦和“郑早”小麦提纯四外推广，领奖受表扬不是场长书记，难道是我？我落了个啥？落了个家属吃商品粮？嗤！那是党瞧得起我，凭良心，干了近30多年才混上个农艺师。人家书记别的不行，三年之间，三个儿女都转了商品户口，一年一个，全是后门！后门，后门，咱场子吃尽了后门的亏。那些后台子硬着的城里人看中了这个离县城不远的国营农场户口，都千方百计把农村的家眷、亲戚塞进后门，转成商品户口，吃农民的血汗。咱穷场白白养活这几十游手好闲、连人都见不着的关系户、寄生虫，每年赔进去万把元粮食款……咱场子的人都认了这穷命，一个月16元工资将就着过，大大的场长半年只见过三次猪油花花……什么？入党？咱过去可是“阶级敌人”啦，写申请几年，就是不让你进党。有人说党不要我。要不是士保八四年闯进组织部门说话，我到现在还是个不清白的人。现在好了，想为党干一阵儿，帮士保打个下手，可不行，老了，想干也干不成了……

——我1978年转业，两年后调到这个穷场子当了个武装

部副部长，官不大，闲差事。冷副场长说的穷日子，我都听到了、见到了。我气，不仅气别人，还气自己。10多年追求奋斗的个“铁饭碗”，竟是这么个东西。你看，捧着这只“碗”，原种场即使饿死人，当官的照样不慌不忙，还把这只“碗”往外送。你把他调走、撤职？这只碗他照样捧。苦就苦在农民们，他们端的是一只极怕风吹雨淋的“泥饭碗”。砸自己一个“铁饭碗”？还有成千上万个存在，我无能为力，那靠邓小平操心。但眼前，原种场的路很明显，穷就穷在死种良种上，怎不腾出一只手，摸点钱花？

场里原有个破窑子，日产红砖只有两千块，我想起河南劳改犯搞的德式轮窑，就帮砖场场长张自贤革新改造成一个吊丝窑，还好，成功了，日产红砖3万块。几位党委委员支持我搞工副业，我就钻汽车改装厂、进二汽去乞求扩散件。妈的，汽车大王嫌咱是农场，嫌咱们一身农二哥相，我毕恭毕敬地奉上一只烟，人家目不斜视，阴阳怪气地说，“不会吃！”见鬼，他的嘴上分明正插着半截子烟屁股……

我黄士保忍了，凭着三寸烂舌头，把人家打动了，二汽老大哥还够朋友，不嫌咱穷，给我们了一大部分扩散件做，我和几个机械能手日夜试验，连古老的榨油机都当成折弯机，弄出了样品，1年多时间，搞了70多万产值，原种场有救了！

虽然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七个春秋，但是，传统的人们对“工”字的禁忌并未那么乐观地消失。即使县里领导也担心怕犯方向错误。县委主要领导传下话来，“农业场子搞啥工业？不务正业嘛！”咱场的书记，平时整天呆在城郊的四间新瓦房里，没事从不去场子里过问，只有地、县领导下来

了，他才在场里露面。这次，他耐不住了，急忙赶到场子里，召开了5人党委会，讨论表决是中断与二汽等厂家几十万产值的业务联系，还是违犯党纪和组织原则，和县委抗过去。书记、场长态度明确，一切听县委的。长期养成的经验告诉他们，听上级的不会错，还有两个委员左右摇晃，我再不说话，恐怕就要失票了。我站起来了，我说咱农场搞工业是以工补农，一可减轻国家负担，二可改善群众生活，三可解决子女就业……我胜利了，三比二。书记动了容，本本一合，拿起帽子就走。那是1983年4月8日吧！

后来我才知道，我把县领导得罪的不浅，当然有人告上去了，说咱有野心，想捞一把，骄傲狂妄。不久，一纸调令，明的是升官，当区武装部长，其实不就是那回事？一耳巴子把我煽到杨溪区，你有日天的本事，就是不让你日！

算了，说这些没得用。你们这些当记者的，我不是厌恶你们，从前来过那么多记者，我再忙，都要挤出一点时间陪他们聊，把心都掏出来了，可他们不理解我，尽管他们洋洋万言吹捧我，但我认为，第一我没有三头六臂，我搞改革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地委行署的支持，得到了地县、财政、物资、金融各部门的支持。没有上下左右的支持，我黄士保寸步难行！第二改革的开山斧一斧子砍下去，不一定就砍得动！我黄士保象头困兽一样与旧体制、旧观念、旧习惯拼命，你们敢写吗？当然我很理解你们，你们是被“铁饭碗”栓住了。

——谢谢，谢谢你的理解，场长同志。

——我张德成还在念农学院的时候，就满腹牢骚，所以入不上党。但我有自知之明。荣誉得失我没考虑，我只是嘴一痒就要说。黄士保被撵走后，二汽61厂原定的价值万元的

潮在滚滚而来，它象一只巨大的弹力薄膜，牢牢罩住夏夜深处多少庄稼人的沉梦。从灯火上可以依稀辨认出在盆地中央——我们脚下的这座楼房林立的土丘周围，是一片麦浪翻滚的农田。在农田与山接壤的盆地边沿，静静耸立着标准件、轧钢、铸造、构件、鸡猪渔养殖以及正在兴建的离合器、炼钢、炼铁、初轧等20多个卫星分厂。它们象九大行星拱围太阳，拱围着我们脚下这块原种场的中枢神经，从一扇扇灯火彻夜不眠的车间窗口，依稀飘来马达的轰鸣和钢铁沉闷的碰撞声，这声音撕裂了农田深处古老、幽深、绵长的田园牧歌——那张无边无际的弹力膜，在这块终于裸露出来的土地上深痛地渗透和超越。

二、真格敢砸“铁饭碗”

1984年9月某日。

原种场一夜之间变了！

在新中国的大地上，端了近30年的社会主义铁饭碗，在谭家湾，被黄士保一脚踹在地上，摔得粉碎。

从这一天起，原种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吃商品粮的干部工人，吃自产粮的农民，以及不见面的吃客们，统统变成了自理粮户口，即以劳动出勤日为依据补贴粮菜差价，公开购买议价粮。首先感到“吃二遍苦”的是那一批被人们白白养活着的不见面的吃客，他们含泪痛骂黄士保，或者钻进城里去继续吃便宜的商品粮，或者屈从变法，靠劳动吃饭……在后门自觉关闭的同时，从前门一下子涌进1000多名青年农民，他们逾越了过去永远无法逾越的户口鸿沟，“洗去脚上的泥巴，穿起鞋袜，走进工厂，加入产业工人的行

端午，我站在县大礼堂门口，等着撤社并区大会散场，出来一位县常委，便毕恭毕敬地递上一份传单……

请愿失败了，我们又含泪去找地委农工部，天下总会有公理的。

这一天到来了。改革的风吹下来，江浙一带在搞一包三改，地委要在我们场办试点！方向明确了，县委也就没那么多顾虑了。1984年7月21日，县委决定我场实行经营承包，在我场贴出一张诱人的招贤榜。

场里的书记、场长焦躁不安，在榜下不停地徘徊：他们也想在改革中再造一次自我，但看到上面一年产值100万，人均收入1000元的目标，他们这辈子一没这个本事，二不习惯，三没经验，他们胆怯了，况且人心又都向着另一个不在场的人。想起这个人，他们不安起来，又发誓要承包场子，“即使搞垮了场子，也不让那个人回来！”他们想的是什么呀！

榜贴出去三天，没人去揭。再这样下去，书记场长真会去揭的。

我们的心提到嗓子眼上，火急派人去送信。7月24日，我们盼望的人来了。他扔下背包，看了一眼榜文，连眉头皱都不皱一下，提起笔在上面草书了三个大字：我承包。

有人说他吹牛，没有。三年后，士保摆弄出了1046万产值，三年累计产值近两千万。远远超过了山。

那天晚上，老书记在家里失声痛哭，改革，太残酷了，他舍不得原种场这只提惯了权柄呀！……

鄂西北的夜，氤氲着山地的沉寂与安祥。谭家湾，这块18平方公里的绿色盆地，眼下只感觉得到一股天边无际的蛙

1000个小料件人家不要了，送去三次，人家拒之门外。场里只得悬赏1000元，求人推销。并且，黄士保走掉、砖厂烟囱不冒烟了，构件厂水泥运不回来，几家订货单位纷纷要撕毁合同，木器加工厂工人打起背包，决计远走高飞……黄士保为场子几千人吃饱饭，有钱花，哪儿错了？共产主义不就是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吗？难道为工厂增加财富也犯法？我和士保两次去找组织部长，请求士保留下，组织部长懒洋洋地穿着个大裤衩子，连凳子都不让坐，两次都是专心专意地擦他那本来就很明亮的家俱，好象家俱上有永远擦不完的灰尘。半天，拖着长腔说，“农业场子，好好种良种，不要异想天开，至于黄士保走与留，是武装部的事，去找武装部长！”一脚踢开了皮球。

我和老冷不服气，咱俩都是搞农业的，是副场长，最熟悉内情，单搞良种生产是没希望的。我们又去向县武装部长汇报。恰巧部长看电影去了。我们只得坐在夏夜街边的电杆上等。蚊虫咬得心里很烦，城里人吃着商品粮，不用担心前途，晚上都出来在街上悠闲散步，咱们看了心里又多上一分孤独与凄清，咱场几千人现在还在眼巴巴地盼着咱们的士保给要回去呢！部长很晚才回来，看到我们后发了一顿牢骚：“你们的场领导不要他，晚了，已报送军分区了。”

莫泄气，为全场人请命，我们心里踏实，再去找县委，办公室进不去，县领导的家又找不着，只好等到下班时，追随着书记、县长屁股后，可人家不松口，要么就是“研究研究。”

看着没法子，我们又没有权柄，又不是人物，只得搬出工会这块空牌子，我们联名饮泪复写了几十份请愿书，五月

列。”（黄士保语）

被人称为“农场主”的黄士保，向他的工人阶级庄严宣布了劳工制度——

干部制度：聘任制。标准：责任心，有本事，不怕得罪人。

用工制度：合同工、试用工、临时工升降制，标准：身心健康、有文化，不偷懒；

工资制度：浮动工资制。全浮，没退路。

场长的态度：想来者欢迎，想走者欢送。

46岁的陈贵生，响当当的国家六级正式工，在“一大二公”的摇篮里酣睡了20多年。他干着一件再轻闲不过的美差：放电影。每天早上，睡到日上三竿，一天三遍“二锅头”酤得一滩烂泥。俟到晚上，糊里糊涂地摸到电影机前，把电影画面放了个倒打颠。放映毕了，还要风雨无阻地赶近10里夜路回家。

承包后，他亏损上千元。

黄士保撤了他的职。

不惑之年的陈贵生，终于惶惑起来。他忽然变成个废物，夹杂在全场100多智力、体力、心力低下的刁钻古怪之中，连降格当工人都没人愿要。他们成了企业的负担，被现代生产所抛弃，成了事实上的失业者。他们承受不住这种巨变的打击，哭泣起来。

黄士保说：“我主张优胜劣汰，但不主张失业。”100多失业者终于象被分烂红薯一样搭配下去了。可黄士保面前仍然站着一个孤伶伶的人，再也没人要了。

“看你这个黄士保把咱这堂堂全民工怎样！”陈贵生不

慌不忙。他深信，共产党搞改革，只会让人更舒服更快活，怎会……

“张厂长，你把他领去吧！”黄士保拉住砖厂厂长。

“不不不，不要。”张自贤如避瘟神。

“看咱的面子。”黄士保走了。

张自贤无可奈何，领上陈贵生回厂。

陈贵生垂头丧气来到砖厂，浑身起了一层鸡皮：乖乖，赤日炎炎，制砖工人背朝青天，泥汗交流，“这是人干的活？我眼一眨就50的人了，后半辈子怎么混转去了，在这泥巴窝里滚到死？”他拉住厂长后襟：“让我坐办公室吧！”

“嘻嘻，我这当厂长的还不坐办公室呢！什么？你有病？能干多重干多重。”张自贤硬得象样。

“老子是堂堂正式工，让老子干这个，黄士保丧德！老子不干毯了！”陈贵生宣告罢工。

“再不干活，我解雇你。”黄士保大发雷霆。

“得了啦！你黄士保敢解雇无产阶级？你想当资本家？告诉你，现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工资你一分也不敢少给！”陈贵生理直气壮。

在我们这个时代，常常产生一些可爱的幽默：十年前，无产阶级卡着自己的脖子去革资产阶级的命，差点自戕；十年后，无产阶级的“代表”将被“资本家”所解雇。这个“资本家”，居然还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和实践者。

月底，陈贵生满不在乎地拆开工资袋，倒了半天，才倒出5元6角钱：“娘的，来真格的了！老子不告倒你黄士保，誓不为人！”

他的誓言成了空话。他黄士保照样耀武扬威地统治着他，而他却不得不走进砖坯中，弯下腰，一把一把地洒沙粒。尽管在前三个月中，他四处上访，喊破喉咙：“黄士保砸了老子铁饭碗！”

三、复杂的东西原本是简单的 简单的东西居然是复杂的

黄道成居然大气不喘，一边用不慢的步子爬坡，一面用他那张早已训练的技巧娴熟的嘴向我们介绍。他这个50多岁年龄的人，让人觉出纳闷，从他那一身紧绷绷不松一颗纽扣的中山装上，可以想象得到在此之前，他是一个修养多年的基层干部形象，尽管斑白的短发下露出几簇微纹，但仍然看得出他微胖的肌肤在闪着光泽。这种光泽不是维生素所能及的。连他自己也不可能想象到，他过去多年没有遭逢过的境遇，在今天这个黄昏的年龄，过迟的遭逢了。

他是黄士保机构改革的物现。原种场办公室的正副主任、科长秘书、办事员等等这个以往庞大的阵容在黄士保手上简化了。黄道成的一双手、一张嘴、一双腿……，总而言之，连他自己还没搞清楚，他的整个生命在今日竟显出了如此巨大的价值。接待参观指导，接待业务交流、接待挑剔刁难……处理文件报告、分发报纸信函，安排当天事物、场长的意志由他变成行动、群众的建议由他变成信息……他是一个机构简化的象征，但他又显示了一个复杂的运转机制……

他领着我们爬上了山埂，坐进了纸箱厂厂长刘恒的会客室。厂长是一个胖胖的大姑娘。他发现我们带着笔记本，忽然警惕起来。“你们是大记者？问我过去？私人抱姆，来场

后由于喜欢学习，被提拔起来的。我现在自己敢去河南、下湖南搞原料。我还敢开除工人！”

敢开除工人？

“是呀！这里招工、开除工人我都有绝对权力。我们总场场长只是管一下大方向和原则。他常说，要把权力下放到最基层去，不象组织部，一个干部的升迁调动、降职离职，要过那么多手续，有的干部隔着几层，组织部长连认都认不得，以什么评好坏，以什么论英雄？”

站在纸箱厂后面的山顶上，向南可以眺望到县城灰蒙蒙的轮廓，向北，便是这一块绿色的盆地。脚下这条山垭，听查过府志的人说，1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森林。30年前的那场钢铁革命，这儿的岭子失去了绿色的轻纱。当然，30年后，黄士保正儿八经地把一座轧钢厂建在这座曾是情感狂热的焦土上，不能不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

轧钢厂的工人们似乎事情并不多，但很苦，很累，很危险。尽管轧钢程序并不复杂——从车间外拣进来从外地购回的廉价废钢锭等，丢进煤炉烧成通红，从轧钢机和工人的头顶上火烫烫地扔过来。这边的工人比较熟练地用大钳夹住，塞进轧钢机。这样，由两边的几个工人轮回送、拽，一根钢筋在七、八个人的工序下完成了。当钢锭还没烧红的时候，他们便站在原地，长时间静等。黄士保看中了这种廉价的资源，他从太原把阎锡山时期的进口钢轨买来了，这老式钢轨在中国大地上，大半个世纪早已成为废物，但在黄士保的大批廉价劳动力手上，通过再一次锻造，它似乎又一次显示了它遗弃多年的价值。——这种废钢轧出的漂亮钢筋，无不被建筑行业所青睐，达到供不应求的境地，投资少，见效快，

工艺简单，效益可以，销路好。在这些简单背后，隐藏的较为复杂的阴影被表面的效益所淹没。

最令黄士保兴致高涨的是他的“四厂一矿”。他很幸运地在他所管辖的地盘上，竟然发现了一个可供他开采90年的大铁矿。对自然的掠夺是一种更为廉价更为经济的事情。有了铁矿他可以炼铁、炼钢，有了钢材，他不愿廉价卖原材料，他还要初轧，铸件，以钢铁为依托，发展技术较为密集和复杂的工业产品，例如离合器……当然，他还没等县长知道，炼钢的车间立柱大梁早已打好架上了。

在轧钢厂东北部，便是那座铸造厂。我们原以为工厂内所铸的零件都很精密而考究，一去，吃了一惊，工厂里的人很忙，比轧钢厂忙多了，有10多人在敲凿铁水凝固了的炉子，大概想把它挖掉重新修复。还有许多人在煤灰堆和土堆里做下水管道的木模子。工人们的手很笨拙，这里很乱，很脏，人们的情绪也不对头。黄道成等我们走出车间后，才说，“别看这样，我们这下水管道却是为深圳某大公司铸造的呢！质量还是合格。眼下，厂子里亏损得厉害，黄场长正在为此头痛呢！”

——我追随黄士保六、七年了，前年9月，我受场长之命，担任铸造厂厂长。心想，这浇铸铁模不就象脱泥坯一样简单吗？一接触，不行了，咱又没个定型产品，好比今日弄回一种型号，立即研究制模，但总是失败，好容易成功，这个型号又没市场，又来了新型号，咱厂技术力量又弱，大部分是小学生加文盲。技术不硬，炉子老是凝固或烧穿，木模又易变形，废品率极高，去年亏了4万多元。钢铁不好弄，人更复杂，70多人，一人一个心眼。我不会做群众工作，场

长给我们分厂厂长定的一句简单准则是“跟上靠下抓自己”。咱跟上头关系不协调，跟下头不畅通，自己又抓不起来。太复杂了，我是个简单的粗人，我不想再打肿脸充胖子了……

面对记者，铸造厂厂长刘兴华懊丧透顶。

翌日下午，场长联席会。

一圈圈沙发围成个同心圆。原种场的全部荣誉都浓缩在这间会议室的四壁上。红色，是一种最为革命的颜色，在二十世纪的黄昏，人们大都懂得革命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面对满墙壁的鲜红锦旗，黄士保是否意识到他就是一个包含全部内容的革命派呢？

可以静静地欣赏一会儿我们的农场主了。黧黑，铁榔头般结实，象一枚短促有力的炮弹。此时他很庄重，端坐于东墙正中，颇象一位东瀛天皇，因为他把鞋子腾掉，赤脚盘坐在三人沙发上。他的眼睛鹰一般审视着整个空间，并在南北送根下的副场长们脸上逡巡。

左边：副场长郑显彬、副书记敖有成；

右边：副场长张德成、副场长冷大林。

这几位“副”字牌并不是按两般文武坐定的，但不失常规的礼仪。

黄士保那张轻易不张开的娃娃嘴动了动，两只嘴角微微翘起一种莫名的嘲讽。让内心虚怯的人不打算与之说话。

他张嘴了：会议议题——铸造厂厂长刘兴华任职不力，亏损严重，怎么办？

——我觉得刘兴华思想不坏，能吃苦耐劳，心眼也好。没功劳有苦劳，他主要是没能力。本着党的一贯爱护干部的

传统，我看将他降成副厂长。若降得太低，对其他干部是不是有影响？

厂党委副书记敖有成紫色的脸膛很严峻，因为他在做一件挽救危亡的事。黄士保这位党委书记把全部的党务工作其实全部压在他的身上，象这满墙的锦旗中，那思想工作、计划生育……都凝着他的心血。他心里至今藏着一个无法解开的谜；过去没改革，他这个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忙得焦头烂额，但无济于事，现在改革了，人怎么都一子变老实了，没有一人吵闹了呢？这刘兴华的问题，也只能算是能力问题，思想应当还是红彤彤的。

敖有成的话使重心失衡。他不仅代表自己，而且代表党委的意志。于是副场长张德成、冷大林等等，全部赞同了敖副书记的意见，因为这意见太辩证、太中肯、无论是因了公事还是私情，这意见都绝对中庸……

“下面宣布决定。”大家对场长的最后决定，似乎并不在意。无非是民主集中制，表示一下。可是，他们分明地吃惊得睁大了眼睛，他们的耳朵里分明地听到场长在不紧不慢地宣布：

——我决定，刘兴华自今日起，调离铸造厂，降职任公路养护班班长。……大家不要激动。刘兴华为创建厂子立下汗马功劳不应抹杀，他长期以来吃苦耐劳、廉洁奉公，因为有自知之明而只拿低工资，现将他任职期间的生活费400元全部补发。

黄士保象在念一个沉重的悼词。但是，他继续说，“我想借这次机会教育全体干部群众，如果以没有坏心，能吃苦就迁就他，再亏损个十万八万怎么办？这样简单的道理，我

们为什么把它搞的那么复杂呢？我们企业，要的不仅仅是好心，同时要的是才能、效益。”

他发现自己又收不住嘴了。干脆扔出一句比较笼统的话：“象没有能力的干部，宁可给高工资让他站到边上，也别让他挡道”。

我们的许多好干部，尽管他没有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由于他的低智能和偏执，造成了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还在宽容、谅解，让他仍旧留在台上，继续他的错误，即使改革一下，也无非是明升暗降，平行调动、考虑关系、注意影响，唯一不去考虑成千上万人的大计。这是一种多么豁达的气量，一种多么巨大的包容性！

四、首长关心在技术之外

飞彩流丹，极尽溢美之辞的记者，是不会把“农场主”的这段屈辱写上文章的。

——那是一段再也不愿提及的往事，我们给别人搞的包装筒，旋压技术始终拿不下来，我招呼了几个头脑灵活的人，冒险闯进了百里之外的某军工厂包装筒生产车间，当工人发现我们几个鬼鬼祟祟地窥视他们手上包装筒半成品时，我们已经跑了，但不幸的是，门卫将我们拦在大门之内。我们被带进办公室，我说我们是买包装筒的，跑错了门，不该钻进技术保密的车间。这一说，他们索性把咱软禁起来。妈的，老子看押了10多年犯人，现在倒轮起自己来坐牢了。伙伴们垂头丧气，我骂他们：“泄气个求？不是为了技术，谁来受这种污辱？这东西记在了脑袋里，他们难道还能把咱们